

试论张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陈纯洁

提要 张洁把她创作的焦点放在中国当代女性的生存境况上，努力探寻当代妇女不幸的多种原因，她的小说透露出浓郁的女性意识。本文从张洁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和所揭示的阻碍女性发展的历史、社会痼疾，探析张洁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内涵、特点及其形成的自身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从而确认张洁的小说在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 张洁 小说 女性意识

The Female Vision As Revealed in Novels by Zhang Jie

Chen Chunjie

Abstract In her novels, Zhang Jie focussed her attention on the life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in an effort to seek out the many causes of their misfortune.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re exists a strong sense of female vision in her novels. In this paper, the impl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female vision and the causes of its shaping against China's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are investigated for analysis of the many women characters created by her and the many obstinate historicosocial illnesses that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China, thereby confirming the unique position of her novels in female literature in our new era.

Key words Zhang Jie novel female vision

张洁在1978年以其处女作《从森林来的孩子》而一举成名，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她既写普通平凡的现实人生，也写惊心动魄的改革生活，写出了女性的人生遭遇、心灵历程和理想追求，在作品中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热忱，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社会的体验和思考。关注中国当代女性在现今社会中的处境、地位，关心她们的命运、前途，发掘女性意识及女性的精神力量和潜在能力，塑造一批自强自立自尊自信的知识女

性形象，是张洁小说创作中最为显著的成就之一。所以，探寻张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当代女性心理的演变过程，全面把握和认识女性文学，更有助于从较高的层次上审视张洁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历史作用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

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它是由性别而引起的一种性别意识。妇女地位的变化，与女性意识觉醒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历史自进入父权制社会以来，女性便成为屈从于父权统治之下的被压迫的性别，对此，恩格斯曾作这样的论述：“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①妇女之所以成为从属的性别，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有意的培养和剥夺的结果，正如法国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彼伏娃在《第二性》中所阐述的：“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造成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决定了女性被压抑的处境，丧失了女性意识的妇女们只能在生活的最底层中备受折磨、摧残，屡遭扭曲、蹂躏，她们很难达到对自身命运、自我生存状况的自觉意识。鲁迅先生曾说中国妇女没有妻性，只有女儿性和母性便深刻地道出了在封建体制下的中国妇女缺乏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历史状况。

中国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始于“五四”运动。“五四”新女性在“五四”强大的舆论世界中，打碎了历史沉重的锁链，开始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自我认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②，成了“五四”新女性的人权宣言。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为对非人地位的反抗，追求人的价值。“女人——人”这一命题的提出，使封建父权意识形态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初步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觉地用辩证的观点来研究妇女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婚姻家庭问题，向警予在《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一文中，试图把妇女的解放、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新崛起的女性作家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丁玲等，她们从时代的洪流中吸收了理性启蒙的精华，努力探索“自我——女性”与时代的关系，探寻个体作为知识女性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从中发现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庐隐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中呼吁：“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③。丁玲在她早期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中，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女性的生存价值，显示了作者渴望把人、特别是把女性当人来看待的强烈愿望。总之，“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方才开始了中国具有独立意义的女性文学”^④。可以说，“五四”运动促使女性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促使中国的知识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3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救亡与大众文学的呼声日益高涨，女性文学中的个体意识融入集体意识，汇入到民族的解放斗争中去，女性作家把个人的追求转化为对革命的向往、狂热。如女作家谢冰莹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献给革命。……再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⑤此后，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随着民族战争和政治斗争而起伏不定，直到新时期，它才得

到重新的审视和认同。

李泽厚对新时期的文化曾作这样阐述：“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⑥现代性的个人主体成为新时期文化的内核，它开始了当代文化中被刻意忽略的部分变为最重要的部分。呼唤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等成为新时期文坛中最响亮的口号，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在这种沉重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滋生了女性的自觉，她们勇敢地接过前几代女性作家手中的火炬，在呼唤人性的同时，渴望表达自己的心声，情不自禁地寻找女性的内质，努力地进行价值自认，她们以特有的内容和气质，和着整个文学大潮，奏响文学的最强音，对当代文化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舒婷以其女性的委婉发出了“我必须是你近旁的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致橡树》）的求平等、求理解的呼声；张抗抗在陆苓苓的身上溶注了对爱情婚姻的执着见解：“宁可死在回来了的爱情的怀抱中，而不活在那种正在死去的生活里”（《北极光》）；张辛欣也在她的小说中向读者展示了“若不平等，宁可不爱”的爱情观（《在同一地平线上》）……她们试图向社会、向男性发出呼吁和抗议，以唤起男性的理解和支持，唤起女性自我的解放。

张洁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作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先锋，崛起于文坛的。她在对自己姐妹的命运进行历史的、道德的、心理的思考时，既恢复了“五四”精神，又跨越了历史；在对性别文化的批判和女性自身的反思时，比起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显得更为深刻和迫切。

二

女性作家张洁，为我们塑造了一代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女性形象，阐释了女性——“人”这一命题在新时期所具有的特性。关心女性的命运，展现女性的生存状态，肯定她们所付出的劳动和智慧，是她小说创作中女性意识的体现。

《方舟》中的三位女主人公：理论工作者曹荆华、翻译柳泉和电影导演梁倩，她们均饱尝了人生的苦果，但能够在痛苦中挣脱出来，在中年寡居的生活中以自己辛勤劳动默默地奉献自己，成为新时代富有奋斗精神的知识女性形象。

曹荆华在十年动乱中，为生活所迫，嫁给了一位森林工人，终因无爱而离异。林区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她落下一身残疾，她默默地承受着。在理论上，她大胆探索，富有创见，顶住了上级与周围的压力。她的人生信条是：只求奉献而不求索取。她认为：“要是人人都想从这个社会里拿点什么，而不想给这个社会创造点什么，那可怎么好呢？”她正是抱着这样的一种责任感去对待人和社会，并希望“人人都能明了，人生的意义在于付出而不是索取。”

柳泉是一位外柔内刚的女性，她业务扎实，富有才华但她从不自傲，当她的翻译工作得到同事和外宾的称赞时，她只是微微地笑了笑。她自尊、自重，面对人面兽心的上司魏经理的无理纠缠和凌辱，不曾屈服和低头，不曾为了自己的前途去逢场作戏，在强

权面前，她维护了女性的尊严，保持着女性的独立人格。

梁倩是一位不畏艰难、卓有主见、敢于抗争、敢于创新的女导演，她忍受着个人生活上的痛苦与不幸，遭受到来自同行的排挤和非议，而她决不妥协，为了获得社会的承认，为了事业，她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曹荆华等三位女性都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历史性一步：不堪忍受没有爱的婚姻的桎梏，视世俗的偏见为粪土，勇敢地结束了失败的婚姻。在她们的心眼中，有着更高的追求——独立的人格和个人的事业，她们有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强烈愿望，有对自己力量的高度自信，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和抗争，她们终于在各自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是，作为“女强人”的三女性，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不甘心地做饭、煮开水，不愿洗刷锅碗瓢盆，在遭受到男性强权的挫折之后，她们有时无可奈何地吸烟、发怒……。生活中的这一面透露出女性自我解放的曲折和艰难。作品展示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后充满痛苦和矛盾的内心世界，指出妇女要摆脱不幸，要求得真正的解放，“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⑦。

《祖母绿》中，张洁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历尽坎坷的中年知识女性曾令儿。曾令儿是渔民的女儿，50年代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在大学时代，她爱上了同班同学左葳，并为他献出了一切：在大海的激流漩涡中，她不顾自身生命危险，冒险把左葳救上岸；在“反右”斗争中，她敢于替左葳承担“反党大字报”的罪责，使左葳免于遭难；在发配边陲小城改造的前夕，她用一个晚上，走完了女人的一生，为此她怀上了左葳的儿子。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她独自抚养儿子陶陶，经受了种种磨难。陶陶溺水而亡后，她又继续过着孤独的生活，然而没有中断事业上的追求。事业，对于曾令儿来说，是她生命绿洲之水，是她献身精神的依托。所以，当她由于自己的专长而被芦北河（曾令儿的同学，后为左葳之妻）恳求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的时候，芦北河希望她能为左葳再次效劳，给他锦上添花，曾令儿经过苦思苦想，终于超越了二十多年的恩恩怨怨，“就在此时，曾令儿觉得，她已经越过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她会去和左葳合作。既不是为了对左葳的爱或恨，也不是为了对芦北河的怜悯。而是为了对这个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⑧曾令儿已经是勇敢地、毫无惧色地接受了过去不幸的人生，但又超越了个人的悲和苦，把个人有限的生命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自觉地融合在一起。作品展示了曾令儿在事业上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在民族的伟大事业中找到自我的奋斗经历和心灵历程。

女性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熔铸了自身的情感体验和对生活的见解，折射出特定时代下妇女的生存境况和心理积淀。如“五四”时期的冯沅君，她在《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四篇系列小说中，刻画的一系列渴望自由、民主的新女性，发出了“生命可以牺牲，自由意志不可牺牲”的呼声，但是，这些女性在走出封建家门之后又踌躇不前，她们是“五四”女儿们叛离家庭后徘徊犹疑的心理写照。丁玲笔下的莎菲，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争取婚姻自主和爱情生活上的理解、平等，而她在脱离家庭后却寸步难行。这一时期的女作家们所营构的女性形象，再现了一代女性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窘迫境况，“她们从闺阁中走出，到了社会，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⑨。其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⑩。四五十年代，由于女作家们想竭力地

表现革命，所以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是囿于“革命+爱情”的模式，如丽嘉（丁玲《韦护》）、林道静（杨沫《青春之歌》）、江玫（宗璞《红豆》）等，这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客观选择。张洁所塑造的“女强人”系列，不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而呈现在她们面前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崎岖之路，这是新时代赋予张洁的得天独厚之处。张洁笔下的女主人公，无论是自爱自强、忠于职守的售票姑娘（《谁生活得更美好》）、奋力拼搏，为了体操事业而多次拖延婚期的女体操运动员（《第六棵白杨树》）；还是在爱的炼狱中备受煎熬而不甘沉沦从不放弃创作的女作家钟雨（《爱，是不能忘记的》），勇于探索、忘情于事业的独身主义者叶知秋（《沉重的翅膀》），这些自强自立的新时代的女性形象，在事业的进取中获得了女性的自尊自信，也获得了女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她们屹立于新时期的文苑中，标志着中国女性自尊自强自立自信的人生追求意识的完善和成熟。张洁在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溶进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也注入了她自己的感受、体验和忧思，使这些女性形象内涵丰厚、血肉丰盈、独具个性，独放异彩。

三

爱情婚姻一直是女性作家热衷的题材，透过爱情婚姻关系，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妇女的命运、价值观念和心灵世界。“五四”时代的女性作家，在选择爱情婚姻题材时，均把反叛的目标指向封建的包办婚姻。女性文学经过几十年的变化、发展，到了新时期，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出现了更为值得思考的问题：名存实亡的婚姻、知识女性在求偶上的被动状态、知识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上的矛盾等，张洁感应到了这一切，并把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无爱家庭的维护这一传统的反叛上，在描写爱情与婚姻的分离时，寄予作家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向往。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在30年代，出于道义、责任，娶为掩护他而牺牲的工人的女儿为妻，他对这种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姻倒也心满意足，并觉得他们“生活得和睦、融洽，就像一个人的左膀右臂”^①。老干部安于现状的心理使钟雨对于爱的呼唤难以得到回声。

《七巧板》中，女医生金乃文和谭光斗的婚姻，是男人强权的产物，金乃文对于谭光斗的残暴征服、俘获所表现出来的妥协、屈就铸定了她婚姻的悲剧，婚后她时时遭到谭光斗的种种折磨、摧残，以致患上了谋害幻想症。但她麻木忍让，从未产生如何摆脱痛苦的想法。

《红蘑菇》中的女演员梦白，明知自己被囚于无爱家庭的牢笼中，对于丈夫吉尔冬的肮脏、卑琐、贪婪、吝啬，她也了如指掌，可她只能表现为无可奈何的忍让。

张洁在这些作品中，通过老干部貌似幸福的婚姻与金乃文、梦白婚姻的不幸，发掘了婚姻与爱情相分离的痛苦，指出封建宗法的人身依附观念乃是无爱婚姻的祸根，她为这些家庭婚姻悲剧而痛心疾首，并在作品中寄寓了她的愿望、理想：“如果我们都能够互相等待，而不糊里糊涂地结婚，我们会免去多少这样的悲剧哟！”^②那么，如何免去这些悲剧呢？恩格斯对此早已作过精辟的论述：“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

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⑬张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多迈出了这一步，如钟雨、梁倩、荆华、柳泉等，她们不再为男性而叹息，她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张洁通过她们道出了：妇女要获得精神上的彻底解放和自我实现，首先必须终止无爱的婚姻，呼唤人们去追求一种和谐的婚姻。这无疑是对传统的婚恋家庭观的一大挑战。可见，张洁对于恩格斯关于爱情婚姻的论述的理解是甚为透彻、深刻的，难怪乎她自称《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是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笔记。

张洁在展示缺憾的婚姻家庭的同时，对理想的爱情进行重构，她以其女性的细腻构造着一个想象的境界，以女性独特的情感体验编织出理想爱情的花环，在钟雨、曾令儿的身上，寄予着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钟雨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年轻时由于幼稚轻信而嫁给了一个“公子”，终因无爱而离异。后来，她爱上了老干部，她明知他是一位有妇之夫，但这丝毫不削弱她的情感：“她那迷恋他，却又得不到他的心情有多么的痛苦啊！为了看一看他乘的那辆小车，以及从汽车的后窗看一看他的后胸勺，她怎样煞费苦心地计算过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⑭钟雨爱得热烈而又理智，为了不去破坏别人的安宁和伤害另一颗无辜的心，她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并把希望寄托在天国之上，在刻骨铭心而结合无望的爱情中度过了幸福而痛苦的一生。这种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情追求，超越了时空，跨越了现实，使钟雨成为“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也使她的人格得到升华。

曾令儿对爱的理解追求又有别于钟雨，她的爱是一种奉献，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她看来，爱“是一种倾心的，不计回报的奉献”，为了她理想的爱情，她不仅奉献了自己的体力和才智，也献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当她意识到政治的风暴将会给他们的爱情带来影响，左葳的情感已有所动摇时，她毅然地撕毁了左葳开来的结婚介绍信，因为她需要的是真正的爱情，而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她希望的是她的爱所引起的回声，而不是一种交换”。曾令儿在对爱情的追求中维护了女性的自尊和权利，她是张洁理想爱情设计的结晶。

四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妇女不但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获得解放，从而避免了钟雨、梁倩等女性重演子君的悲剧——离开经济的考虑徒然地追求个性解放，惨死在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⑮中。但现今社会对女性的观念认识却仍然存在着凝重的传统观念，旧的传统观念和世俗的偏见随时压迫着事业女性的心灵自由和思维活动，甚至直接造成事业女性在生活上的痛苦。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竞争机制的启动，女性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应地减少，许多单位明显地存在着排斥女性的倾向，张洁的小说对这一切进行了无情的披露，闪耀着女性意识的火花。

《方舟》中，作者借梁倩之话道出：“妇女的解放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还应该包括妇女本人以及社会对她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正确认识。”“妇女并不是性而是人！然而有些人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不幸的是有些女人也以取悦于男性

为自己的生存目的，这完全是一种旧意识的反映”^⑩。正因为社会对梁倩等知识女性的存在意识和价值缺乏充分的认识，才造成了她们的苦恼甚至是悲哀。在世俗的眼中，离了婚的女人“不属于谁，便好像属于任何人”^⑪因而她们的人格每每受辱。来自男人的强权，又使她们步履艰难，以致每迈开一步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曹荆华在理论上大胆探索，得到了单位作风正派的党支部书记的支持，饶舌的人们不放过她，对她大造舆论，说他们之间有所谓的不正当关系；高级市侩白复山，为了利用岳父的关系，让梁倩成为他的花瓶，毫无廉耻地纠缠梁倩；居委会的贾老太婆，对她们指桑骂槐，密切地监视着她们的行动，企图从她们身上获得一丝不轨的线索；柳泉的丈夫不把柳泉当人看，而是把她当成“性”工具，他的粗暴和虐待，几乎成为柳泉每晚无法逃脱的灾难。当然，性格软弱的柳泉不会像台湾女作家李昂的《杀夫》中的女主人公林市那样陷入绝境：受到丈夫令人发指的“性”虐待，又遭到邻里的讥讽嘲笑，忍无可忍地走上杀夫的道路。但是，对于这些知识女性来说，更难以忍受的是她们对事业的追求不被理解和自身的价值不被承认。梁倩在电影艺术上不断创新，以其心血导演了新片，却遭到上级及同行的排挤、非难、否定：“那个工人睡觉打呼噜怎么打得那么响？这不是丑化我们的工人阶级吗？”“那女主角的奶子怎么那么高哇？真的还是假的？啊？要是存心垫的，我看这可是一个严重的思想问题，要认真地讨论、讨论。这是不是色情，啊？不是诱导青少年犯罪又是干什么？不要搞成黄色电影啊，我说梁倩同志。”^⑫经过步步的升级、层层围攻，梁倩的片子被枪毙了。这种来自社会的舆论、世俗的偏见、男性的骚扰，男人的强权，使她们“常常是这样：晚上，三个孤单的女人，坐在那盏落地灯的暗影里；旁边，晚餐后的桌子上堆着一堆因为心绪不佳，谁也懒得洗的碗盏。或是这两个人不声不响地抽烟，听那一个人诉说受到的委屈；或是那两个人不声不响地抽烟，听这一个人愤怒地用拳头敲击着沙发上的扶手。”^⑬这就是她们表现悲哀、发泄不满的方式。《方舟》再现了女性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的艰难过程，使人深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淫威。作家从肯定女性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出发，对限制、压抑、阻碍妇女发展的社会现象表现出莫大的愤慨。

张洁的小说也向读者昭示了千百年因袭下来的传统思想在现代妇女身上的积淀。《方舟》中的钱秀瑛，不求上进，见识浅薄，业务水平低下，却凭貌美献媚在单位里左右逢源，时时博得领导的欢心，她甚至对于丈夫把她当做附属品而洋洋自得，津津乐道。她的存在，成为柳泉等知识女性前进的绊脚石。

金乃文虽受过现代的高等教育，可骨子里却是个节妇烈女的胚子，习惯于屈辱的地位和被压抑的精神生活。她麻木、僵化、守旧。婚前，她受到谭光斗的践踏，婚后，又备受谭光斗的折磨，而她却逆来顺受。作品对她进行了无情的嘲弄：“金乃文呢，连逆来顺受都算不上，整个就是一个慢性的麻痹、中毒。那些毒液慢慢地渗透开去，至血液、骨骼。”^⑭这种自轻自贱的奴性正是妇女不能认识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悲剧。当她被封建伦理道德异化时，她自身的悲剧便转化为社会悲剧，使勇于追求的女性更加地不幸。张洁对这类不自尊、不自爱、不自重、自轻自贱的女性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并把她们当作旧的传统意识的沉渣给予批判，呼吁人们尽快地荡涤历史的沉淀和封建的尘埃，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用心颇为良苦，体现了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

通过小说揭示当代妇女的真实处境，揭示女性意识觉醒后的知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

和阻碍其发展的传统惰力，这方面起步较早的作家还有张辛欣。她在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写了一位知识女性执着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彷徨、困惑和痛苦，表现了对男女平权、两性对等的女性意识，但相比之下，张洁的小说更为深刻、冷峻，其女性意识更为鲜明、强烈。

张洁小说女性意识的形成，与她自身的经历和个人的气质是分不开的。张洁“是个穷人家的孩子”，母亲的离异，使她童年时期就过早地感受到人生的寂寞和悲凉。她只能在“丰富的、朴素的、恬静的大自然里，充补着自己的精神。”张洁曾说过：“这样的生活境遇使我得益匪浅，它磨练了我在人生斗争中的意志，塑造了我的性格，教会了我热爱普通人，同情别人。”张洁的文学素养不但来自中国文学，还得益于西方“充满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古典文学的陶冶”^②。契可夫、雨果、托尔斯泰，对张洁的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深厚的文学修养，敏感、多情的气质，以及后来离婚的孤独，使她很容易将自己的情感投向社会与现实人生，投向作为社会悲剧和人生悲剧的主要承受者的女性身上，创造一种艺术化文化化的人生追求。总之，张洁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获得，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个人的、文学的种种因素的综合。

张洁这一名字已伴随着我们走过了整个新时期的历史，她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等小说中，揭示了女性的生存世界，讴歌了女性自尊自强的精神，反映了妇女解放新的历史要求和内涵，可谓是维护女性自身尊严的宣言，体现了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和成熟。她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代表了当代知识女性的思想形态和心理状况。正是这种强烈的女性意识，构成她作品中的精华，体现了她创作的真正价值。张洁自觉地完成了女性文学的历史使命而独领风骚于摇曳多姿的女性文苑之中。

(责任编辑：翁奕波)

-
- | | |
|---|---|
| <p>①、⑬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页、第80页。</p> <p>②、⑮ 《鲁迅全集》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第126页。</p> <p>③ 《庐隐选集》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p> <p>④ 陈繁琰《文学广角中的一个世界》，《艺术广角》，1987年第3期。</p> <p>⑤ 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谢冰莹》，第269页。</p> <p>⑥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p> | <p>⑦、⑧、⑪、⑫、⑯、⑰、⑲、⑳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从书·张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285、23、32、26、208、121、207、148页。</p> <p>⑨ 《鲁迅全集》第四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98页。</p> <p>⑩ 《鲁迅全集》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p> <p>㉐ 张洁《七巧板》，载于《花城》1983年第一期。</p> <p>㉑ 《我的船》，张洁小说散文集《方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 |
|---|---|